

东盟主导下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分析

莫翔

(云南财经大学 经济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关键词: 东盟; 东亚区域合作; 困境; 展望

摘要: 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是由小国集团—“东盟”发起推动并主导,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其区域合作方式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的方式—“亚洲方式”。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原因在于:中日之间的矛盾;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态度;日本“雁型发展模式”的失败。东亚这种小国集团主导的区域合作存在着两个结构性缺陷: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难以建构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从现实来看,大国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缺位”与“不合”是导致东亚区域合作踟躇不前的主要原因。美国、中国与日本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大国,推进三个大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是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

中图分类号: F1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755(2010)01-0024-04

二战结束以来,区域主义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冷战后,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地区新的经济与安全问题开始凸现,区域主义进程在世界各地再掀高潮。继欧洲、美洲、非洲区域主义浪潮之后,东亚区域主义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趋势。而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东亚却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将对东亚区域主义进程的独特性与内在弱点、以及可能的发展做一分析。

“区域主义也称地区主义,是二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种区域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称。它是一定区域内的若干国家为维护本国与地区利益而进行的国际合作与交往的总和,是伴随着地区组织的大量产生和区域合作实践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潮。”区域主义有新旧区域主义之分,旧区域主义的特点是:内向性、政治与军事倾向、欧洲中兴主义等;新区主义的特点是:开放性、外向性、经济倾向、多样性、亚洲性等。

一、东亚区域主义的发端——东盟的建立与发展、及“亚洲区域”模式的确立

作为一种客观进程与外交实践,东亚区域主义在1960年代被提及倡导,19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其试图通过在区域内构建多边合作框架或机制,以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一体化是其最后目标。

东亚区域主义应该始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简称东盟)的建立,东盟是东亚地区最早建立也是最为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在东西方冲突中寻求中立、寻求经济上的合作以提高该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寻求谅解以解决地区内部存在的各种争端是五国联合起来的直接原因。”就动力而言,东盟的建立似乎是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与国际区域合作运

动的发展增强了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的信心,但安全考虑也是催生东盟的催化剂。1960年的美国对越战争、以及苏联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这使得东南亚国家必须寻求集体自立更生的方法谋求生存与发展。在上述背景之下,东盟最终于1967年8月8日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基于平等与合作的精神,通过联合的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通过在本地区国家之间关系中尊重正义与法治以及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东盟的成立标志着区域主义在东南亚正式形成。从功能上看,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到1992年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主要是以一个政治论坛的地位而存在。

从1992年开始,“东盟”开始了其重组的进程,成员国数量有了增加,除了文莱是1984年加入东盟之外,后来增加的成员国都是1992年以后加入东盟的。此外,1992年之后,东盟在功能上向综合方向发展,1992年倡导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倡导“东盟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1998倡导“东盟+3”(东盟10国、中国、日本以及韩国),1999年签署“东亚合作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2001年倡导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2007年11月,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宪章》,明确将建立东盟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写入宪章。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重申在2015年之前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这是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也是一份指导性文件。2008年12月正式生效的《东盟宪章》明确规定:东盟共同体将由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组成;建成后的东盟共同体将具有一个

收稿日期: 2009-11-21

作者简介: 莫翔(1978—),云南保山人,法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目标、一个身份和一个声音,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2008年,东盟还逐步完成了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以及第二次东盟一体化行动计划蓝图的起草工作。

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其区域合作的方式即“东盟方式”最为引人注目,这种方式迥异于以往最为成功的“欧盟模式”,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方式,被学术界称为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东盟方式”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没有表决,也不存在否决;第二,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的谈判过程;第三,政府间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东盟方式”的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不仅体现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中,而且被应用于东亚地区合作中,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1999年的“东盟+3”以及2001年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都是基于这些原则建立的。此外,东盟在其进程的几十年间,还确立了一整套处理区域内部关系的规范和原则,这些原则对推进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加拿大著名学者阿米塔·阿查亚将这套规范和原则概括为四个方面:不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区域自治和集体自主;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抵制东盟军事协定及偏好双边防务合作。

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域合作是由大国推动和主导不同,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是由小国集团——东盟发起推动并主导。首先,东亚区域经合作的主导框架“10+3”会议是在东盟积极倡导下确立的。并且一直在东盟的组织框架中进行,会议的议题和日程主要结合当年东盟首脑会议的议题和日程来确定。其次,东盟现有的合作一直是东亚区域合作得以展开的主要基础,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主导着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此外,东盟还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参与东亚合作起着协调作用。

二、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原因

(一) 中国与日本的矛盾

不论依照现实主义理论,还是北美、非洲、欧洲的区域合作实践,大国理所当然的是区域合作进程的主导与核心,然而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却由小国集团来领导。以弱小国家集团安排一系列程序规范,并说服地区大国接受并适应这些规范是东亚区域合作主要特点。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东亚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国、日本之间的互不信任。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观念结构才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才是使得物质结构具有意义的社会性结构。做为国际政治最主要行为体的国家,是根据各自的文化历史传统、思想意识、价值体系和思考方式去认知他国,界定“他者”的,并以此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依据。日本泛滥的右翼思潮、错误的历史观,以及不对二战的侵略历史做真诚的反思和道歉,加上对美日同盟的新定义和不断的加强军备,甚至出台周边事态法支持台独

势力染指中国台海问题,这一切都使中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深表关切和疑虑。而在日本看来,曾遭受其侵略的中国的日益崛起,不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对其都是巨大威胁,“中国威胁论”的观念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在一些日本人看来,中日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的冲突。

中日双方较深的历史积怨,加上政治、经济上的竞争与矛盾,使得中日不能像法国德国那样和解携手共同领导推进欧洲区域合作那样推进东亚的区域合作。此种状况,为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留下了可操作和利用的空间。

(二) 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态度

随着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对即将崛起的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作用,出现了两种观点“大中华圈论”与“中国威胁论”。“大中华圈论”立足于历史上曾经在东亚存在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认为“朝贡体系”是东亚国际体系的基础,“中国威胁论”主要基于三个假设:(1)在历史上,中国依靠“朝贡体系”主导东亚地区;(2)中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将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利益;(3)中国军事的崛起将会威胁东亚安全。上述两种观点在东亚国家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时难以消除。这使得中国在东亚的区域合作中难以给自己的作用与位置做出定位,而且进一步使得东亚的集体认同变得复杂化。

(三) 日本“雁型发展模式”的失败

二战后,经过20多年的经济复苏成为经济强国的日本,推出了试图主导东亚区域合作与建构东亚新秩序的一系列构想,其于1960年代首先提出了“亚洲—太平洋构想”,接着1970年代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最后是1980年代以后提出了“雁型发展模式”。其中以“雁型发展模式”最为著名。根据“雁行发展模式”的构想,在东亚地区,日本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头雁,“四小龙”随其后,东盟国家收其尾,通过投资和贸易,东亚地区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是一种类似于雁型的方式展开的区域经济合作。但是1990年代中期后,日本经济开始步入了漫长的低迷状态,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金融机构纷纷撤离东南亚,“雁型发展模式”早已难以为继。

三、东盟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难题

相较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东亚区域合作是滞后的,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小国集团主导。

首先,由于缺乏大国的有力领导,东盟自身内部的区域合作也显得踟躇不前。东盟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与越南不愿意或不可能在东盟的内部合作中充当领头羊的角色,印尼认为地区事物与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不大,因此并不全身心投入区域合作事务,而越南却是经济实力薄弱并且社会制度迥异于其他东盟国家,这使其不能领导东盟的合作进程。而且,东盟成员国纷纷与区域外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自

由贸易谈判,使得东盟看上去“四分五裂”。

其次,作为一个小国集团的东盟,国际体系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尤为突出。东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与地位就是例证,危机过后,有着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与日本对危机受害国家提供了援助,中日两国应对危机的能力与对危机国家提供援助的行为使得使他们在“清迈协议”的有关地区安排中成为了主角和领导者。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重整中,东盟却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更多的是作为受援助对象,难能与地区强国讨价还价。而在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展开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东盟也难以主导谈判进程,中、日、韩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第三,处理区域安全问题一直是区域合作需关注的主要领域问题,而东盟对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却显得无能为力。东盟不仅难以解决成员国之间彼此存在的历史宿怨和紧张关系,而且也无力协调大国之间在东亚的关系。对于东亚区域存在的安全问题——南沙领土争端、朝核问题、中国台海问题、中日领土争端、日韩领土争端、以及东盟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东盟一直是束手无策。

第四,东盟国家所处区域是大国利益的交汇之处,美国、中国、日本是三个最大的在东南亚具有自身利益的大国,此外,近年印度为拓展其安全利益与大国影响有东进趋势,国家力量逐步的得到恢复的俄罗斯也有重返东南亚的可能。为避免大国争夺区域合作的主导权,东盟一直在大国之间施展“以夷制夷”的平衡外交,试图通过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确保自己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为了防范中国、日本在东亚地区做大,东盟一直借重在东亚有重大利益需求的美国的力量牵制中日两国。对于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东盟的这种战略尤为明显,东盟一方面采取与中国展开接触战略的同时,又积极地利用美国的力量牵制中国。在东盟国家与中国关于南沙领土的争端中,东盟巧妙的利用美国对中国实力崛起的担忧,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大胆的向中国提出了不合理的领土要求。此外,东盟还利用印度东进的战略企图,让其参加到东亚事务中来,期望其成为东亚地区一个新的平衡力量。东盟对大国的平衡战略,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东盟不仅没有实现使得自身成为大国合作的平台的初衷,相反却使得东南亚成为了大国角逐影响力的场所。

总体上,东亚这种小国集团主导的区域合作实践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结构性缺陷:难以调动大国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难以建构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

四、大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困境

从历史的经验看,大国一直是区域组织建构与区域合作得以展开的关键,从东亚的现实来看,大国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缺位”与“不合”却是导致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踟躇不前的重要原因。

(一) 美国与东亚区域合作

从目前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来看,除了

美国之外,其他东亚大国都参加进来了,只有美国被排斥在东亚合作进程之外。美国在东亚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需求和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因素是影响东亚区域化进程的重要变量,绕过美国的东亚区域合作是不现实与不可能的。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美国在主观上不愿意被排斥在合作进程之外,客观上美国并没有形成较为清晰、长远的东亚政策。美国希望维持东亚的稳定与自己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不过美国的这一战略企图是依靠其自身在东亚地区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来完成的。美国乐于见到朝核问题、中国台海问题的久拖不决,更乐于见到中日两国的对立与互不信任,朝核问题是美国介入东亚问题的借口,维持台海现状是迟滞中国崛起的手段,而充当中日两国关系的“离岸平衡手”却是美国在东亚维持地区力量均势与自身在东亚主导地位的关键。

从东亚合作的现实与未来展望考虑,能否积极的引导美国成为东亚合作的一个建设性力量将是关乎东亚区域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美国被排斥在东亚合作进程之外,美国势必会采取与该地区的国家展开双边同盟的形式分化东亚区域合作。如何定位美国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地位作用是重要的。对此,可以参照欧盟一体化进程,美国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美国却通过北约的存在参与了欧洲安全秩序的建构。在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中,美国也不会追求东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但是美国在乎的是其在东亚的利益必须得到保证。为此,东亚的区域合作进程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不排斥美国利益和承认美国是建构东亚安全秩序的重要参与力量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美国成为东亚合作的破坏性因素。

(二) 中国与东亚区域合作

从地缘政治和从地缘经济的角度考虑,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决定东亚区域合作前景的最大因素。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经济实力上超越日本是迟早的事情。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政治上,中国是东亚国家中唯一一个可以在东亚与美国形成力量平衡的国家。因此,中国似乎是最有资格领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国家。不过,中国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领导国家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第一,由于东亚国家对中国有可能恢复历史上“朝贡体系”的担忧,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东亚国家不太可能支持中国的主导地位;其二,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软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等。”尽管中国近年来软实力有很大提高,但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国家制度与发展模式

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又不能提供一套东亚国家认可的关于区域合作的框架、原则、制度等,以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足以整合整个东亚的认同。因此,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应该以推动者而非主导者的角色参与到东亚合作进程中,构建良好稳定的地区关系以及和谐的区域合作机制而非地区霸权才是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目标。

(三) 日本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本是东亚国家中最早试图在东亚建立安全秩序的国家,“大东亚秩序”旗帜下的“圣战”就是日本在东亚建设安全秩序的尝试。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不大可能成为政治与军事强国,加之在外交战略上受制于美国,日本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是不现实的。但是,鉴于日本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其将是世界与东亚地区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国际与地区力量。1990年代以来,日本与其它东亚国家经济依赖日益加深,如果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态度冷淡,东亚区域合作将难以成形。冷战之后,日本一直采取经济与外交的手段抵制中国在东亚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或获得与中国并驾齐驱的影响力。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国,日本将可能积极借重美日同盟来影响东亚区域进程。日本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将会加重日本在东亚区域进程中的分量。

东亚的区域合作目前的状况是,东盟无力单独领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而中美日三国尽管具有各自的优势与特点,却都缺乏单独领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绝对资质。东亚区域合作未来的蓝图只能建立在东盟集团的积极引导,大国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东盟应该成为协调大国利益共生关系的平台,而不应该成为大国角逐影响力的擂台。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关键要取决于东亚三个大国是否具有或形成利益共生点,并以此为基础达成谅解,与东盟共同推进区域合作。

五、大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设想

冷战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扩张,中美日三国之间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相互依存的经贸组合,三边相互钳制而又难以分割。这是三方有可能共同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基础。但是仅仅有经济利益上的共生,并不足以促成中美日就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展开全面合作。中美日三国还必须做政治战略上的调整。

对于美国而言,尽管加强美日同盟与充分介入东亚事务是确保其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但是只有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积极主动与中国就东亚安全秩序建构展开战略对话,才是真正确保美国东亚利益的保障。

摆脱“政治侏儒”的地位,在政治与军事上崛起,一直是“经济巨人”日本的战略目标,冷战后日本深感日本有形成独立自主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政治大国”的构想,但日本要拥有独立的防卫力量,成为正常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它的亚太战略必须要调整。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与他的战略构想是有矛盾的。安全

战略上,日本严重依赖并受制于美国和日美安保条约;外交上,日本明显的凸现美国中心主义。日本在强调“政治大国”的同时又严重依赖日美轴心关系,这是日本外交战略的最大困境,外交战略自主是政治大国的首要条件,也是国际社会承认一个国家为大国的一个标准。经济和政治命脉掌握在另一国手中是任何真正的大国难以接受的。日本务实派认识到,东亚合作才是日本摆脱外交战略两难困境并真正走向世界大国的最佳途径。

为进一步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国东亚战略也应调整。进入21世纪,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快速崛起,这将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近年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对东亚一体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但为东盟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加深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程度,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东亚地区的一个经济中心与推进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使得东盟国家在战略上不得不重估中国在东亚的重要性。

中国的崛起不仅使得其再次成为东亚的地缘政治中心,而且使得亚洲的地区自我治理有了可能与依靠,亚洲有可能真正摆脱近代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东亚治理的状况。中国是东亚地区唯一的可能在东亚地区平衡美国外来力量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崛起也引起了东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担心与疑虑。为此,中国必须调整自己的东亚政策思维:尊重与承认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所起的平台与协调性作用;调整对日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要求;在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承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促使美国在东亚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且应该承认美国在平衡日本力量上所起的作用。

积极推动大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并构建大国在东亚地区的合作与协调,是东亚区域合作得以快速推进的关键。美国、中国与日本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大国,推进三个大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是未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郭延军,王春梅.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6 (06): 79-80.
- [2] 金熙德. 东亚合作的进展、问题与展望[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 (09): 49.
- [3] 王正毅. 亚洲区域化: 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05): 6-8.
- [4] 梁志明. 论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兴起与东盟意识的增强[J]. 当代亚太, 2001 (03): 14.
- [5] 夏立平. 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J]. 当代亚太, 2005 (06): 18.
- [6] 阿米塔·阿查亚. 建构安全共同体[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67.
- [7] 唐小宋. 三强共治: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选择[J]. 现代国际关系, 2008 (02): 12.

责任编辑: 迈夫